

英德文史资料

第五期

44103/160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英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人物事迹

- 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莫 雄 (1)
- 余日昆先生在英德县立中学办学点滴
……………杨家瑜 忆述 陈 评整理 (19)
- 抗战期间英德县教育事业片断的回忆……………谭 雨亭 (21)
- 郑中中体育运动的优秀成绩……………曹 亦文 (27)
- 米市在英川片拾……………冯 秉全 陈 静书整理 (28)

地方资料

- 英德革命烈士陵园简介……………谭 灶扬 (31)
- 我县火站的命名及其建制……………陈 评 (35)
- 我县防治甲状腺病的经过……………胡 克妹 (38)
- 英红华侨茶场……………郑 红生 许 求洪 (41)
- 饮誉中外的“英德红茶”……………黄 斐 严 国辉 (43)
- 擂茶粥……………潘 古 孙 (45)

旅游名胜

- 集岩洞特色大成的宝晶宫……………曾 昭璇 (47)

目 录

人物事迹

- 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莫雄 (1)
- 余日昆先生在英德县立中学办学点滴
……………杨宴瑜忆述 陈评整理 (19)
- 抗战期间英德县教育事业片断的回忆……………谭雨亭 (21)
- 郑中申体育运动的优秀成绩……………曹亦文 (27)
- 米帝在英州片拾……………冯秉全 陈静书整理 (28)

地方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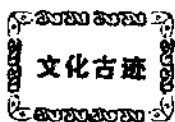
- 英德革命烈士陵园简介……………谭灶扬 (31)
- 我县大站的命名及其建制……………陈评 (35)
- 我县防治甲状腺病的经过……………胡克妹 (38)
- 英红华桥茶场……………郝红生 许求洪 (41)
- 饮誉中外的“英德红茶”……………黄斐 严国辉 (43)
- 擂茶粥……………古孙 (45)

旅游名胜

- 集岩洞特色大成的宝晶宫……………曹昭璇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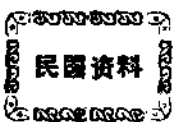
著名书画家关山月为宝晶宫题书的巨型摩崖石

刻介绍.....陈 评 (49)



英德县城的书院及其特点.....杨海涵 黄 亮 (52)

古英州八景及其名人诗拾.....苏神济 (57)



民国时期英德县历任县长(知事)表.....县志办 (63)

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

莫 雄

开始做朋友

1928年，张发奎为李济深所反击，退出广州，投靠蒋介石。不久，又在湖北宜昌反蒋，旋即失败，逃抵广西，联合李宗仁，出师东下，企图夺取广州。抵达广州近郊白云山附近时，张部有两个师为蒋介石收买，阵前倒戈，李、张联军溃败，逃返广西。

我当时任张部新编薛岳第二师第三团团长的。出发进攻广州前，奉张命到广东组织“别动军”，李、张兵败后，我立即遣散别动军，也回到广西。

1930年底，我感到跟随张发奎没有什么出路，便跑到上海，见到了宋子文，当时宋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给我以财政部视察的职务。蒋介石却忙于屠杀革命人民，国民党人大都拜倒在蒋介石脚下，但也有人坚决反蒋的，如何香凝、邓演达等。全国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

我的财政部视察，是一个挂名领干薪的官儿，终日闲荡。恰好碰到旧部刘哑佛，他是安徽合肥人。1925年我任建国粤军第十一师师长时，由同盟会员金维复等给我介绍认识的。当时我见他头脑新颖，思想进步，就任他做我师的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个月，我师为蒋介石所缴械，便分开了。这次上海重逢，欣然道故，十分高兴。从此他常到我寓

所闲谈，并介绍严希纯（解放后任全国计量局局长）、项与年（真名梁明德，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华克之（解放后在国务院外交部任职）以及袁良邨、何文凤、莫铤等同志与我往来。我感到他们都是朝气蓬勃、革命精神充沛的人，我和他们相处，极感愉快。他们常把革命道理讲给我听，从言谈中发觉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渊博的学问，使我非常拜服。他们又把苏联革命的经过，详细给我介绍，还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当前的革命形势，讲给我知道。我真是顿开茅塞，对他们更加爱重。互相之间，情感更笃。他们知道我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就请我设法保释几个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我也愿为之奔走。便去找当时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文与我素有交情，在我请求和劝说下，便把几个在狱的共产党员释放了。刘哑佛等很感激我。我当时非常倾慕共产党，极想参加党，请严希纯作介绍人，严请示上级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李叫严转知我说：“莫先生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想参加共产党，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不参加党为好。今后参加党的机会很多，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凡对党有利的事，望莫先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共产党，能做到这样，我们就十分满意了。”我听后，觉得很有道理，极为高兴。表示就这样办。

上海抗战

我在上海（1930—1934），还接触到一帮“政学系”人物，首脑是杨永泰、张群，其中还有国民党实力分子，如海军司令李根源、陕西都督李震华、贵州省长吴鼎昌等。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早与我认识。因我在1922年率第七独立旅

在他家乡茂名高州等九个县肃清盘踞在那里的陈炯明三万多残部，又击溃了有二万之众的黄明堂。我旅纪律严明，不伤害老百姓，故杨很佩服我。杨在上海见到我时，曾拿出他的《削藩论》给我看。这篇《削藩论》是剽窃日本大臣伊藤博文文献给天皇的一部著作。杨将它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著作。把当时各地方军阀矛盾冲突的情况，研究分析后，提出外交上倒张作霖；政治上倒汪精卫；军事上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上倒张发奎、李宗仁，以蒋介石一统天下为张本的策略。这叫“四大纲要”，献给蒋介石。蒋如获至宝，立即委杨为作从室秘书长，从此杨得到蒋的宠爱。杨为了炫耀自己，又表示对我的尊重，因而特意给我看这本《削藩论》。我看后假意表示十分赞赏。

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战开始了。全国同仇敌忾。

一天深夜，宋子文派他的亲信陆文澜、张海安用小汽车来接我。他们说宋子文要我去接张远南税警总团第三团团长职务。张远南是宋子文妻舅，恃势获罪于陆文澜、张海安，陆、张便向宋子文搬弄是非，说张远南曾对守卫太阳庙的士兵说：“如果日本仔打来了，便从墙洞中逃走。”宋子文怕这话传出去对自己不利，故惺惺作态，要撤张远南职，并将我提升为团长，带兵打仗，为他捞取政治资本。税警总团第三团是实力雄厚的一个团，有四、五千人，其中有二千广东兵，干部都是张发奎第四军旧部。我见到宋子文，宋把要我当该团团长的意思也说了。我说：“现在正在打仗，阵前撤军官职，影响不好，且张团长又是你的至戚，马上撤他的职，面子上也不好看。”我还表示可以在税警总团做个参议，若第三团有战事，可到那里指挥，平时则在总团长黄琪翔身边帮忙。总团长黄琪翔当时亦在座，他平日对张远南也很讨

厌，认为如果撤了张的职，不让张吃点日本人的苦头，是便宜了他。黄赓赞同我做他的参议，（其实心中另有盘算）宋子文同意了。我到徐家汇税警总团驻地时，黄赓在总团参谋长以及八处处长们的座谈会上介绍我和他们认识，说：“莫先生是孙总理的信徒，是第四军名将，又是宋部长的老朋友，现部长派莫先生到我团部参与打日本仔，你们应该把他看作是我一样，听他的便是听我的。”讲完后，他又将机密文件和地图等交给我，旋即收拾行李，作远走状，我很是惊异，即问黄赓：“这是干什么？”黄掏出几张在美国大使馆任职武官的美国“西点”大学同学名片（黄曾留学西点），说要去美领事馆探望他们。说完便离去，我送他出门到花园小径上，他扶着我的肩膀边行边说：“莫大哥！你这次来，真是太好机会了。”我诧异地问他：“这话怎么说？”他说：“过两天你就知道了。”说完神秘一笑。以后才体会到，黄怕和日本打仗，先溜开，我会代他当总团长。

两天后，黄赓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乘三轮摩托车到了日租界美领事馆，出来后，又到“礼查”英国饭店找他前妻陆小曼，黄还不知道这间饭店已为日军占领，改为日军司令部了。黄深度近视，直到门口，看守门的是日本兵，大吃一惊，不知所以，想从另一门口进去，及至发现所有门口均有日军守卫时，才恍然大悟，慌忙逃走，日军见状，便将他拘捕了。第二天，在日本报纸上，用特大标题报道“阵前俘虏国民党将军黄赓”，并将黄照片附在报上。宋子文得知此事，大发雷霆。通过各国外交团体，费了很多手脚，才把黄赓弄了出来。宋对他申斥一顿，后把他送进监狱。黄入狱后，宋子文把我提升为税警总团长。我上任后，马上通知上海正在抗战中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

等。我又立即派税警总团第二团在庙行阵地抗击日军。两星期后，在一次战斗中，该团利用装满泥沙的麻包作为掩体，向日军进攻。日军用重炮集中轰击，不到两个钟头，该团阵地全毁，死伤七百余人。我便指挥士兵继续作战。当年放映一部记录片《中华光荣史》，便有我骑马指挥作战的一些镜头。

不久，日军在浏河登陆，直插十九路军后方，该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掩护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全线转移，我们税警总团被指定驻在松江、青浦。当抗战部队撤下以后，蒋介石立即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蒋介石这种投降卖国的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怒。

牯岭会议

1933年10月我在上海闲居无聊，便到江西南昌找薛岳，薛当时任江西“剿共”部队第二路军总指挥。早在广东驱逐龙济光时期，我与薛已认识，后来他任张发奎部下的旅长，在张联合李宗仁、陈济棠“反蒋”失败，薛离开张，蜚居香港。这时，薛岳先后受到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以及南京蒋介石的邀请，但未作出到那方面去的决定，正踌躇间，我在港见到薛岳，他问我应到那方面去好。我劝他到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去。广西地瘠人穷，广东地方狭小，而南京长江一带，正是鲲鹏展翅之所，大有可为。薛听从我的话，即到南京依附蒋介石。蒋介石没有实践他给薛任第五军军长的许诺，只给他副职，薛甚失望，打算离开，我见到他，又劝他忍耐等待。不久，薛果然飞黄腾达，一跃而为蒋手下反共的悍将。这时，我去找他，他对我极其客气，招待我住在南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办事处内。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百花洲

花园，逢到杨永泰。杨见到我，十分高兴，即邀我到他的家里，在他家见到陈布雷、陈方子、罗坤强等八名他的机要秘书，我也是认识他们的。杨要我住在他家，这个家就是他的办事处，他在二楼办公，从不让别人进去的，但对我却特别青昧，任我自由出入。我又在此住了约一个月。一天，杨永泰亲热的与我谈话，说知道我向与蒋介石很好，表示愿意替我向蒋“搭线”；他告诉我，现在江西分区成立“剿共”保安司令部及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他准备推荐我担任专员和保安司令。我当时表示感激。这两天，杨带来蒋介石给我的委任状和组织表，一份是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委任状，一份是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委任状。再看两份组织表，都是空白的。我说：“杨公（杨别号），承你介绍，让我当上了这两个官，可是怎么一个人也不给我的？”杨永泰笑着说：“我一个人都不介绍给你，你自己去找吧！”言下之意，是对我极大信任。他还递了一张五千元大洋支票给我，说是“蒋委员长亲自批的。”似要我向蒋感激知遇之恩。当我走出杨永泰住宅时，心里很不平静。我想：世界上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把官送到手里，还把钱送来，蒋、杨为什么如此厚待我呢？无非想我为他们的反革命卖命。难道用五千元就能收买了我吗？我倒觉得反感。我又想到，现在让我做“剿共”的官，就是做刽子手去屠杀共产党，屠杀工农，我若出卖良心依了他们，我岂不成了孙中山的叛徒？这正是我深恶痛绝之事。但委任状已接了，怎么办呢？我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我何不趁这个机会，让共产党来当这个“剿共”保安司令的家奴？蒋介石“剿共”，要就保共、通共。我想起在上海认识的几个共产党员，于是我立即到上海，找到严希纯、刘哑佛、华克之等几个共产党员朋友，将两份委任状及组织

表交给他们看，并告知经过。我说：“我相信孙中山三大政策，这是可以救国强国的，而蒋介石反共剿共是要亡国的。蒋介石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但做的却是叛徒的事，我岂能为虎作倀。我对你们共产党人很佩服，相信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严、刘等人听后，互相对看一番，没有立刻答复。我见状，便更加明确地端出自己心事说：“你们不讲，让我讲，我要用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你们把这两份东西拿回去和上级商量研究，假如信得过我英雄，请你们派些党员来与我一同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他要“剿共”，我要“剿蒋”。他们听罢，十分高兴。由严希纯接过我的委任状和将两份组织表带走了。1934年3月底，我负责的江西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以及负责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班子，在上海地下党的研究安排下组建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由胡毅、陈修爵担任，参谋长卢志英（又名卢涛，1948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情报参谋长项与年，情报组长贾绍澹（又名贾作，解放后任四川长寿县狮子招待所所长），专署主任秘书刘嘏佛，专署文教科科长阮恩之（解放后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任科员薛代旦（曾任中共广东顺德县县委第一书记，组织被破坏后逃到上海），科员丘锦（烈士），科长傅尚先（解放后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人。这都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研究商讨后派来的，组织表上介绍的几十名同志，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除了项与年、刘嘏佛两人外，其余我都没有见过。他们和我很快到江西就任。其中陈修爵副司令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又由上海地下党调走了。我到南昌由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拨三个保安团给我。这个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和行政专员公署设在抚德安。这地方位于南浔铁路中段，按蒋介石说法，这里

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我就任后，在司令部内秘密活动的党组织马上与当地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在共产党巧妙安排下，我的“剿共”部队也象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结果是“击溃”红军。“消灭了”当地苏维埃政权。不到六个月，在我所辖的地区共军已“绝迹”了。事实上红军部队，奉命转移到别处打击敌人，苏维埃政权转入地下。我将“剿共”捷报不断送蒋介石，蒋派人调查，认为“属实”，非常高兴。给我以“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蒋介石对我也不是完全放心的，他派一个在南昌行营的军统特务谢也夫到司令部及专署内任联络长官。这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到德安后，不知怎的被他抓到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关在一间房间里，这位女党员，坚贞不屈，宁死不向敌人投降。在一个晚上用蚊帐布扭成绳索系在梁上，自杀身死。对这个狠毒的特务谢也夫，我司令部及专署的共产党员都分外警惕和小心。刘哑佛则主动与谢也夫周旋，整日好酒好菜去请他，并投其所好和他谈天说地，吟诗作对，刘哑佛俨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谢看不到什么可疑之处，解除了对刘的疑心。同时谢也夫知道我和蒋介石、杨永泰的交情，因而也不敢怎样放肆。只是常在司令部及专署行来踱去。人们对之非常讨厌。

我在专署，一切工作均交由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办理，做得十分干净利落，其他的党员我也与之接触。项、刘等常和我讨论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分析当前形势和世界各国与苏联的情况，使我更加了解革命的意义，更坚定了革命信念。上海的严希纯不时到我司令部作客，与刘哑佛、卢志英等秘密开会并与我会晤。他又来往于南昌、南京之间，非

常忙碌。我却不知他干什么。

1934年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有一年，10月初，通知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各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到庐山牯岭开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绝密会议，研究如何加速“剿灭”苏区根据地的军事部署。我因“剿共有功”，“考成第一”而被蒋介石特邀参加，会议在极其森严和保密之下进行的。蒋亲自主持会议，具体事项由蒋南昌行营秘书长、行营第二厅厅长杨永泰负责。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具体策划和进一步贯彻其所谓“铁桶围剿”的方针，这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由一百五十万大军，包围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包围半径距瑞金三百华里。地图上划分了编了号的格子。某个部队，某个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包围地点，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然后按照任务马上布上铁丝网，构筑火力网及碉堡等，一俟包围完成后，便按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一·七华里左右，每推进一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十华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位置使得他们的火力将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六个月围到红都瑞金。而红都瑞金四周则有三百重铁丝网，三十重碉堡线。每道铁丝网之间的防守，也要求十分坚固。要设立大量碉堡、地雷阵，如情况变化，用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调运部队。“围剿”中的火力布置、粮草、交通、电讯、医疗、药物、弹药都有详细的部署。在包围未组成以前，派十二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包围圈形成后，这十二个师随即撤离。而且在会议前几个月已经在德安一带可以看到大量铁丝网运来了。各个部队装备也大大加改善。美制军用卡车一千辆也已运

到了。事实上这次“铁桶围剿”的军事部署，在会议前早已进行了。

会议文件很多，足有三四斤重。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几十份，还有蒋介石的语录、指示汇编及其他小册子，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的“极秘密”印记，并接名单编了号码。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结束时，蒋介石致闭幕词，向与会者打气，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面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等等。在场的二百多反共军事头子，个个气势汹汹，纷纷发誓要在本次“铁桶围剿”中“剿灭”红军。他们喜欢得太早了。散会后，我返回德安保安司令部。征尘满面，来不及梳洗，便召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到办公室。屏退卫兵，关上房门，把文件给他们看。他们飞快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完。三人交换了眼色后，刘哑佛问我：“大哥！你说怎么办？”我说：“还有怎么办的？这样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上党中央。”他们一齐站了起来，异口同声而诚恳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您！”他们的话，引起我心头一阵激动。随后他们即指定项与年将这些绝密文件送到南昌我保安司令部后方办事处，找到几个精干的年青的地下党员，将文件的主要部份全部密写抄录并马上发电报报去党中央。然后将稿件全部焚毁；将抄录的密写文件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送瑞金党中央。两个星期以后，党中央率领的红军开始了轰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项与年在外地不幸被捕，他为了维护我并没有说出是我的参谋。经过地下党千方百计营救，越狱逃跑，用砖头磕破了四个门牙，化装为乞丐，逃避敌队的耳目，通过重重

封锁，历尽艰险，历几个月时间，跑到延安。

红军过毕节

红军长征离开江西以后，1935年3月某日，我忽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我马上乘飞机到贵阳。我当时以为将庐山会议情况送共产党中央的秘密已经败露，又想到项与年一去不返，莫非他给逮捕了？心中犹豫不决，便找刘哑佛商量，问他：“此行是凶是吉？”刘想了一下，便笑着说：“若是我们事情暴露，蒋介石知道了，用不着叫你到贵阳，他可以叫你到省城开会，把你抓起来。大哥，你放心吧！”我到南昌，蒋介石的座机正等着我，飞到汉口加油时，一群军统特务借口运送重要物资占用我这架飞机，我知斗不过他们，只好让他们飞走了。但我怎么到贵阳呢？南昌行营参谋长晏励南劝我找五省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借飞机，我也只得去见张，张慷慨答应把他们的飞机借给我，于是我到了贵阳见到蒋介石。原来蒋介石要我担任贵州毕节“剿共”保安司令及督察专员，去堵截长征中的红军。他配给我六十三师整个师，叫我指挥。我接受了他的命令，把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和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都带到贵州毕节。把熊式辉派的三个保安团，交回了他。

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过去曾在各种宴会上见薛岳对我称“大哥”，很是恭敬，以为我来头不小，对我颇为顺从。贵州毕节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交界之地。据情报，这地区果真有七、八千红军的伤病员和掉队的人员。如果让陈光中去对付这些伤病员，那么他们处境就极不好了。我心里十分焦急，好在刘哑佛、卢志英抓住了陈光中极爱女色的特性，借口与他做媒娶妾，整日用酒灌他，并且真的给他找到

两个漂亮的“小老婆”，陈喜出望外，沉溺于酒色之中。约每隔五天左右，就请我和卢志英、刘哑佛去赴宴，将“剿共”工作，抛到九霄云外了。我当然也不给他发什么指示，更不过问他的行为。这时蒋介石给红军牵着鼻子走，东奔西扑，过了半年。这样，毕节红军伤病员也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了。

我在毕节，常到“贵州才子”周培艺（又名周素园）家中坐谈，周是一个绅士，家藏书画极多。我与他纵谈古今，探讨各种问题。我常把共产党人对我讲的道理和他讲，他认为我对政治理论很有研究，深为敬服。那时贺龙、肖克率数万红军将到毕节，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污蔑红军，当地百姓，纷纷逃离，周也准备逃走。我问他为什么要走。他把听到的谣言告诉我。我说：“周先生！我认为你不必相信这些谣言。共产党红军是人民子弟兵，是革命部队，是讲道理的，是爱护人民的，你不要走，待红军到了，你就说莫雄叫你留下的。”周培艺相信我的话，留了下来，不久红军到来，对于周的不走，认为稀奇。有某政治部负责干部去见他，周说是莫雄叫我不走的。红军政治部干部对这位周培艺很好，和他深谈起来，对他讲了不少道理，周对共产党十分好感，表示要跟随红军长征，红军也欢迎他。因他年纪大，还用轿子抬他走路，历尽困难，到了延安。后经党的批准，1942年回到贵州，还写信给我，备述中共的伟大，正确，他们革命一定成功等等。解放后被造为贵州省的副省长，这是后话了。

1935年12月，陈光中师调离毕节。红军有三四万之众，由贺龙、肖克等率领开向毕节。我把部队撤到毕节城外十多里的山沟。红军派一个参谋送给我一信，内云：“莫雄先

生：你是我们革命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也已加入。我们一致公推你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签名的有贺龙、肖克、夏曦等九人，并署名为红军军事委员会。我接信后，不知如何是好，我专署及保安司令部官佐职员合起来，只有几百人。加上彝族的警政大队三百人，也不够一千，枪械又陈旧。要就任这黔军总司令，在我看来是开玩笑的。于是我向这红军参谋说：“你们二、三天内就要开差，你们一走，我不是成了无兵司令？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烦你转告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还可以帮你们的。”过两三天后，红军过了毕节，蒋介石知道我部对红军一枪不发，让红军过境，勃然大怒，命令把我扣押。后来我获悉，扣押我另一个原因是我曾托回上海去的专署主任参谋共产党员黄贻书（上海地下党派来我专署的），带信去找李怀诚（这是我在上海认识的共产党员），打听我老朋友华克元的下落。不料李怀诚参加了暗杀国民党第六次全会首脑事件，（这次事件汪精卫因拍照时被击两枪受伤，蒋介石临时未参加拍照而幸免。暗杀者由照相机的后边向那些参加拍照的人射击的，当时暗杀者被张学良拔枪当场打倒。后追查是多党派人士组成的暗杀团所干），正在被追捕，黄贻书到李怀诚家，中了埋伏。被捕后，在黄的衣袋内搜出了我给李怀诚的信。于是我便犯了“通共”及“暗杀”的嫌疑。被押送南京军法处关了起来。据狱官说，这间监房，是当年蒋介石关押邓演达的。我悼念邓的死而又想到自己也不能幸免，对蒋介石极为愤恨。我被关了一百五十天，却没有被提审，我想，也许是由于杨永泰的出力。

1936年5月，我被张发奎、薛岳、陈诚保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杨永泰叫他们保释的，这次保释，正值两广